



二十世纪全纪录

周丽琼 主编

1952

# 目 录

中国部分 .....	1
世纪回眸 .....	1
朝鲜战场 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	1
中国科学院参加反细菌战的科学调查 .....	4
新中国体育健儿首次参加奥运会 .....	5
中共中央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	16
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	17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	21
国际主义战士——一级模范罗盛教 .....	30
新中国培养出第一批全体女飞行员 .....	32
烈火金刚——一级英雄邱少云 .....	34
特级英雄——黄继光 .....	37
一级英雄——杨连第 .....	37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使用细菌武器 .....	38
中国抗议美国残杀战俘 .....	39
关闸事件 .....	40
上甘岭战役大捷 .....	42
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工 .....	108
小资料 .....	110
世界部分 .....	112
世纪回眸 .....	112
世界“雾都”的劫难 .....	112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遭到指控 .....	114
土耳其和希腊加入北约 .....	138
1952 年芬兰举行夏季奥运会 .....	139
冬奥会挪威奥斯陆举行 .....	140

奥运会进入苏美抗衡的年代 .....	142
莫里亚克获诺贝尔文学奖 .....	148
美国建造出世界第一艘原子动力潜艇 .....	149
1952 年船舶碰撞民事管辖权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	150
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霍尔洛·乔巴山逝世	153
小资料.....	158

## 中国部分

### 世纪回眸

#### 朝鲜战场 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 1952 年秋季，战线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敌我双方作战活动仍属于前沿侦察、警戒战斗和小规模的阵地攻防战斗。停战谈判由于敌人坚持扣留我方被俘人员，自 5 月起便一直陷入僵局。

至 1952 年 9 月，朝鲜战场上已经维持了 10 个月之久的低烈度的保持接触的胶着状态。此时进入朝鲜的秋季，泥泞雨季已过，标志着适合军事活动的季节来临。为打破战俘问题导致的谈判僵局，粉碎敌人可能发起的局部进攻，同时为锻炼新换防部队的作战经验，中朝两军决定对敌进行战术性反击，并于 9 月 14 日下达了战术反击的作战命令。随后，自五次战役以来中朝军队最大的一次反击开始，攻击目标仅限于前沿易打的阵地。

此时，正面战线敌我双方的态势是：敌军第一线展开 15 个师，第二线 3 个师；我军第一线展开志愿军 7 个军、人民军 2 个军团，第二线志愿军 3 个军、人民军 1 个军团。

9 月 18 日，我军开始在全线发起战术反击作战。整个作战至 10 月 31 日结束，历时 44 天。

在这次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志愿军的战术有着人民解放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些新特点。在组织反击时，主要依托坑道体系。攻击之前，部队在前沿坑道集结，或在我方火力控制区挖屯兵洞隐蔽，能以突然性的短距离冲击，攻入敌方阵地。在攻击兵力配备上，步兵突击部队减少，而支援的炮兵和工兵增多，通信联络也大为加强。反击的步兵部队数量，一般对敌方之比只有 2 : 1 或 1 : 1 ; 而支援炮兵攻击一个敌人的连阵地，平均要集中各种炮 8 — 1 0 个连，约 4 0 门左右。这些新采用的战术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同时也突出了技术兵种和步兵协同作战的整体作用。

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从 9 月 1 8 日开始至 1 9 月 5 日结束。第 3 9 军由于准备充分，于 9 月 1 8 日首先发动反击。随后志愿军 6 个军（第 3 9、第 6 5、第 4 0、第 3 8、第 1 2、第 6 8 军）和人民军 2 个军团（第 1、第 3 军团），总共对 1 8 个目标的敌军进行了 1 9 次反击，其中美军阵地 7 处，韩军阵地 1 1 处。

经作战，中朝各军都按照预定作战计划，攻克了敌军阵地，其中巩固占领者 6 处，共歼敌 8 3 0 0 余人（其中美军 2 0 0 0 余人），我军伤亡 2 0 0 0 余人。

反击作战的第二阶段从 1 0 月 6 日开始至 1 0 月 3 1 日结束。志愿军一线 7 个军，共组织了 1 个团另 1 3 个连又 2 3 个排、3 5 个班的兵力在 7 6 0 门火炮支援下，在 1 8 0 公里正面上同时向 2 3 个目标的敌军发起攻击。经过作战，除第 3 8 军攻击韩 9 师防守的 3 9 4 . 8 高地（白马山）和 2 8 1 . 2 高地未获成功外，其余目标均于当夜或翌日攻占，并全歼守敌。

10月8日至21日，第65、第39、第15、第12、第68军又先后进攻了11个目标的敌军，其中四个目标攻击未成，其余均达成预定目的。在这次反击作战中，第15军于10月12日反击391高地时，事先将冲击部队于敌前潜伏。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炮击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为保证潜伏部队的安全，严守潜伏纪律，直至壮烈牺牲。他的英勇壮烈的行动，赢得全军的尊敬。

按计划，我军原定10月22日停止反击，转入正常防御。鉴于敌人于14日发动金化攻势，大举进攻上甘岭地区，战况日益激烈。志愿军首长决定将战术反击作战延续至10月底，以配合上甘岭地区作战。23日以后，第65、第40、第39、第38、第15、第12军又先后攻击了14个目标，除3个目标攻击未成，1个目标守敌撤退外，其余目标均被我军攻克，并全歼守敌。第二阶段反击作战，我军共对敌48个目标攻击58次，其中美军防守的9处，法国、荷兰、加拿大军队防守的3处，韩军防守的36处，共歼敌1.89万余人，巩固占领阵地11处。

我军秋季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对敌连、排支撑点及个别营防御阵地共60个目标攻击77次，最后巩固占领敌连排支撑点17处，共打退敌排以上兵力的反扑480余次，全歼敌两个营指挥所、10个连、69个排、8个班，大部歼灭敌两个团、一个营、7个连、8个排、5个班，共毙伤俘敌2.72万余人（其中人民军毙伤俘敌1700余人），我军伤亡1.07万人，敌我伤亡对比为2.54：1，其中在打敌反扑与反复争夺中共毙伤敌军1.

9 5 万人。作战中共缴获各种火炮 3 2 门、各种枪支 2 3 7 3 支，击毁各种炮 5 7 门、坦克 6 7 辆、汽车 7 4 辆，击落敌机 1 8 3 架，击伤 2 4 1 架。

### 中国科学院参加反细菌战的科学调查

从 2 月 29 日至 3 月 5 日，美军飞机侵入东北上空撒落带有细菌的昆虫、树叶等竟达四百多次。3 月 7 日，竺可桢、吴有训两位副院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对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声明。随后院即组织科学家进行科学调查，具体任务由实验生物所昆虫研究室等承担。被派往东北调查的马世骏及其助手，于 3 月中在各个地区采集美军飞机撒落的昆虫尸体，并见到细菌弹残骸和许多用来携带病菌的羽毛。3 月 29 日，郭沫若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扩大会议上，建议由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美国在中国和朝鲜撒布细菌的罪行。

6 月中旬，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六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到达北京。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任联络员。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参与配合调查工作。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主任陈世骧领导该室人员对美军飞机撒布的多种昆虫进行鉴定，写成《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美国细菌战报告书内有关昆虫的若干事实》。朱弘复和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一道，7 月上旬从北京出发，赴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调查。植物分类研究所的植物学家钱崇澍、林镛、胡先骕、俞德浚、吴征镒等对美军飞机撒下的树叶进行鉴定，确证美军的细菌战罪行。8 月 31 日，在北京举行《调查在中国和朝鲜的细菌战事实国

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签字仪式。报告书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武器。报告书中肯定了中国科学家在科学调查和分析中所做的大量工作。随后由《科学通报》出版了《反细菌战特刊》。

## 新中国体育健儿首次参加奥运会

1952年7月29日，在第15届奥运会闭幕前夕，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奥运会赛场。此时各项比赛已近尾声，只有印尼归侨吴传玉赶上了男子百米仰泳预赛。由于旅途晕机不适和时差，吴传玉在第二天上午的比赛中只得了小组第五，未能进入决赛。8月3日下午七时，第15届奥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闭幕式。

这是新中国体育健儿首次参加奥运会，虽然它没有在体育史上留下多少值得书写的事迹，但是，正是由于这次参加而导致在1952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体育的发展，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1952年的巨大影响。

### 1 两个方针的产生

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对新民主主义体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认识，十分强调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952年6月荣高棠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代表体总筹委会作的报告，表明普及是建国初期我国体育的基本目标。广播体操、锻炼标准开始在全国推广，群众体育组织大量建立，业余体育短训班广泛举办，就普及体育的程度而言，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空前的。

但是，在 1952 年出现了两个新的提法，也可以说是两个新方针，从此成为中国体育的指导性方针。这两个方针，一个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一个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后来的中国体育中，前者被认为是指导方针，后者被认为是工作方针。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毛泽东 1952 年 6 月 24 日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所书题词。这个口号在后来的一切官方文件中，都被当作是中国体育的指导方针。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也可以认为是出自毛泽东之口。历史上最早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一方针的，是八路军 120 师师长、后来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1940 年 7 月，在他与政委关向应同志联署的 120 师《体育训令》中指出：体育运动应当在全师内广泛开展起来，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同时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经常组织比赛的表演，选出优秀选手再去指导普及。这里不但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思想，而且实际上也提出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个为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公式。

不过。这个《体育训令》毕竟只对 120 师有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与整个体育联系起来，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1942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两次发表讲话，阐述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方向、方法，提出了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就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应该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讲话》不仅规定了文艺工作的方向和根本任务，也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延安活跃的体育界迅速接受了《讲话》的思想，并且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思想与整个体育发展结合起来，1942年下半年，延安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有关言论。

但是，1952年以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却几乎成了体育的专用语。这是从1952年的一个中央通知开始的。当中央决定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后，2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通知中说：

世界体育活动日益增多，国际友人希望中国能去参加也甚殷切，最近我们已宣布了准备参加将在荷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4届（按：原文如此）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但由于中国过去体育基础差，近年来几次出国参加球赛，水平较低，与今天的国家地位极不相称，此种情况亟须改变，因此，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而不在适应范围内加以提高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发展。里的字是刘少奇同志批阅时加上去的。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却标志着中国体育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无论是《体育训令》还是毛泽东的《讲话》或当时延安人士关于体育运动应力求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种种议论，普及和提高的对象都是一致的，即毛泽东所说的：向人民大众的普及，在人民大众基础上的提高。但1952年2月18日《通知》却在提高之前加上了一个限制词：在适当范围内。这样，提高与普及的对象、范围就都有了区别。在当时，把提高约束在适当范围内也

许是出于领导精力或人、财、物力不足等方面的考虑，但在后来体育的实际发展中，它却造成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相对分离。2.18 通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国家已经开始把体育（准确些说是竞技体育）与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提高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大突出出来。

最初，我们是打算用办体育学院的办法来完成提高的任务的，2.18 通知的后半部分就提到：中共中央已批准在首都创办体育学院，集中全国各项体育活动最优秀的选手加以培养。但在实践中，提高的任务却并没有、至少是主要没有落在体育学院肩上，而是落在了先后按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级体工队（后来称优秀运动队）身上。这种长年集中训练的优秀运动队，是此后 40 多年中我国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冲击世界体坛的基本队伍。这样，提高就开始和竞技体育直接联系起来了。从此，不仅提高开始和普及一道成为了我国体育的基本目标，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也开始具有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相结合的含义。

## 2 两个机构的建立

参加奥运会不仅使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体育机构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委托青年团主管体育工作。1949 年 10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当中国决定参加第 15 届奥运会、并对奥运会和奥委会事务有所了解时，才发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中国奥委会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跑到台湾的原总干事郝更生，已经抢先通知国际奥委会称中国奥委会会址已经迁到台湾。因此，1952

年3月初，体总接到国际奥委会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全国体协的会籍。3月11日，冯文彬会同廖承志（对外文委主任）、董越干（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荣高棠（体总秘书长）等人反复商议，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系由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应自然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其所属各单项运动协会中的地位。当时，原体协的大多数主要领导成员都留在大陆，为了顺理成章地使体总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体育组织，全国体总筹委会一方面按照国际奥委会原则修订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一方面准备继续参加原体协已加入的举重、拳击、篮球、足球、网球、田径、游泳、自行车、体操9个国际单项运动协会，同时在1952年6月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了争取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权益斗争的需要，很快又改称成立大会为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把1949年10月的筹备会称为成立大会。

但是，体育总会毕竟是一个社会团体，而许多体育事务是需要政府出面来处理的。在百废待兴而国家经济、文化和体育基础又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只有利用国家权力，对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集中管理，才能优先保证竞技体育的发展。显然，建国初期那种体育管理制度是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当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的领导成员在奥运会后考察苏联东欧体育以后，他们的这种感觉十分强烈。1952年8月21日，刚刚从赫尔辛基奥运会归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团中央秘书长、全国体总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上书党中央，汇报了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并提出了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的建议。9月6日，体总主席、教育部部长马

叙伦也向政务院提出了一份相似的报告。两份报告都提出了应象苏联那样在政府中设立体育运动委员会以及成立体育学院、集中训练优秀运动员、举办全国运动会、修建大型运动场等建议。团中央的报告中还建议由贺龙任体委主任。9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指示：拟同意这些建议，主席阅后送邓副总理办理。当天毛泽东就圈阅了两个报告。9月15日，邓小平约见荣高棠，指示：现在就要搭架子，准备人选；要扩大运动队伍觚定选拔标准，到各地选拔；要建运动场，但不要离市区太远；要尽快筹建体育学院和批准召开全国运动会。同时，他又给政务院副总理贺龙打电话，通知中央决定请他兼任即将成立的体委主任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将军——这位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在八路军中大力倡导开展体育运动、著名的战斗队的培育者、新中国成立后只用短两年多时间就使素来落后的西南体育跃居全国前列的体育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央体委（1956年后改称为国家体委）主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的部一级国家体育行政机关。中央体委（后来改称国家体委）以及随后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府体委的成立，表明体育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正式确认，为体育发展提供的重要的组织保证。

### 3 两位委员的会面

在体委成立后第一批调到体委和体总工作的人员中，有两个人后来为争取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权益和地位作了很大贡献。他们就是董守义和何振梁。

董守义，河北蠡县人，1895年生，通州潞河书院毕业，曾留学美国春田学院体育系，多次作为运动员、教练或总干事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任职于天津青年会和南开大学时，与周恩来在体育方面交往甚多；抗战期间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1947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52年时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1952年3月，董越千在起草的关于参加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的专题报告末尾部分谈到运用旧人员问题时，专门提到原体协负责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董守义，现在兰州师范学院教书。已电查其解放后表现。待情况掌握后再研究如何具体运用。3月23日周总理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示进一步了解董守义的情况后请他来京一谈。

26日，董守义从兰州启程进京。这样，在时隔32年以后，董守义与周恩来这位当年由于体育而结识的学生，又因为体育而走到一起来了。只是他始终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把他调来北京。不过，董守义也从来没有向周围的人提起过自己和周总理的关系。

董守义怀着喜悦兴奋的心情找到了在王府井大街一个偏僻胡同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总副秘书长黄中和工作人员晏福民、熊斗寅热情接待了他。董守义这才知道此行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商议有关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的事。他用了两天时间向晏、熊二人详细介绍了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的情况，然后三人商量提出了一些有关参加奥运会和奥委会的初步意见。

此后，董守义以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义与国际奥委会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争取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能以中国

唯一奥委会组织的名义参加奥运会。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参加7月17日的国际奥委会第47届全会，而是委托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工作人员盛之白作为私人代表列席。当晚得知奥委会以33票对20票推翻了执委会拒绝中国运动员参赛的决定，但仍然未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明确决定。当董守义29日随团赶到赫尔辛基以后，与多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见了面，并参加了8月1日的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董守义的到来粉碎了台湾方面围绕董守义真伪的许多谣言，使许多委员在1954年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站到了中国一边，那次会议以23票对21票通过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没有承认在台湾的全国体协是中国奥委会。

几十年后的人们回首这段往事的时候，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让董守义早一点到赫尔辛基去参加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董守义到芬兰后的情况证明：如果董守义能亲自参加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而不是由对董守义本人、旧全国体协乃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情况都不甚了了的盛之白作为代表参加，台湾就更不会有什么市场，或许这次会议上就有可能通过后来在1954年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才获得通过的那个承认体总为中国国家奥委会的决议——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一系列旷日持久的复杂问题。

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现存的就是合理的。今天我们只能认为：当时的一系列作法都是历史自身的选择。

1952年以后，董守义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奥委会的活动，为维护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地位和权益而努力。1956年，由于当时国际奥委

会主席布伦代奇的顽固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董守义辞去了委员职务。

对于他的工作，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经作了充分的肯定：董先生参加几次国际奥委会会议，表现很好，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场发言的。

在董守义参加的几次国际奥委会会议中，有两次是和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何振梁一起参加的。

何振梁，江苏无锡人，1929年生，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董守义走上体育道路是因为他的体育才能，何振梁却是因为他的语言才能。

说起何振梁成为一名体育工作者，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50年4月，刚成立不半年的团中央到上海选拔外语干部，震旦大学是法国教会办的学校，全部课程都用法语教学，因而法语人才当然只有到震旦大学去找。这个任务落到了震旦大学的团支部书记熊斗寅身上。又要法语好，又要政治上可靠，熊斗寅为难了：这样的人可不多呀！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团支部宣传委员何振梁和另一位同窗好友。可是，当他去找他们谈话时，他们却不愿意到团中央去：我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何振梁说，因为他已经在作一个发电厂的毕业设计，在他的心里，正在勾画着祖国电力建设的宏伟蓝图。另一个同学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熊斗寅好说歹说，还是没有能说服他们，无奈之下，他只好拿出了最后的法宝：你们是青年团员，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和需要。

于是，三个人在离毕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告别了母校，一起来到了团中央，成为团中央国际部的工作人员。由于当时团中央同时主管全国体育工作，何振梁也

就从此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参加了 1952 年赴赫尔辛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在回国后不久响应他技术人员归队的号召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但 1955 年 2 月贺龙又亲自向二机部要回了何振梁。3 个月后,他就作为翻译随董守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50 届全会,1956 年 1 月他们又一起参加了在意大利科蒂纳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51 届全会。从此,何振梁再没有离开过体育。1981 年,他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的第 334 号委员。

#### 4 1952 年两个阶段的划分

1952 年,随着参加第 15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开始悄悄地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使 1952 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上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当时的人们也许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变化的意义,但变化却确实发生了:

第一,体育仍然以普及为基本目标,但普及再也不是唯一的目标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在国际交往和国际运动会中取得好成绩,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激励民族精神服务,也开始成为体育的基本目标,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二,与此相应的是,组织长年集训的代表队成为了实现体育任务的基本方法之一,其地位日益重要。群众性体育活动虽然继续蓬勃发展,但过去那种独自享有的重要地位已不复存在,代表队一群众体育从此成为体育工作的两大重点。

第三,参加奥运会促进了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体育总会成为基本的体育组织系统,各级体育行政机构建立并逐渐完善。